

# 上海文革時期 毛澤東像章的流通與生產

• 金大陸

文化大革命以前，上海金店和上海徽章行業曾製作過金質、銅質的毛澤東像章（因年代久遠，發售量少，現已成為藏家的珍品）。文革時期，除了上海聯合徽章廠、上海金屬工藝二廠、三廠等為毛澤東像章的定點生產單位外（據1966年度統計：上海聯合徽章廠共生產各類徽章3,058.8萬枚，其中毛澤東像章2,004.4萬枚。1967年至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開時，以上三廠共生產毛澤東像章2.05億枚）<sup>①</sup>，許多工礦企業、大專院校和部隊均自行組織生產，其數量之大，品種之多，不僅使那些定點廠難以望其項背，更為毛澤東像章「交換場所」的形成和擴大奠定了基礎。

從收藏心理的角度說，一般個人擁有了十枚左右的像章，便會萌發收藏的情趣和意識；個人之間或出於喜好、或為了豐富藏品發生的交換則不僅是隨機的，而且是頻繁的。毛澤東像章的收集和交換作為一種社會的集體行為，大多數人都不同程度地裹挾其中，並通過在一定的「場所」實施和進行。在上海，至1966年的第三季度已開始形成交換場所，至1967年春節前後，在全市範圍內已生長出十二處頗具規模的交換場所。黃浦區為多，有南京路黃陂路口、山西路等五處。還有閘北區的北站、長寧區的曹家渡、虹口區的提籃橋等地<sup>②</sup>。

固然，由文革所掀起的對領袖的愛戴和效忠，是毛澤東像章得以流行的主要原因，它具體表現為社會適時的大量生產和人們趨時的廣泛佩帶。據上海報章報導：1966年8月，上海毛澤東像章的生產量為十八萬枚，9-10月，月生產量猛增為一千萬枚，生產廠也由一家增至九家。工人們還「反覆學習老三篇」，日夜加班，大搞技術革新，努力提高毛澤東像章的產量和質量。人們佩帶毛澤東像章已成為文革開始以來的一種「時尚」<sup>③</sup>，甚至有的電影院檢票進場時，還得查看是否佩帶毛澤東像章。

由文革所掀起的對領袖的愛戴和效忠，是毛澤東像章得以流行的主要原因，具體表現為社會適時的大量生產和人們趨時的廣泛佩帶。1966年8月，上海毛澤東像章的生產量為十八萬枚，9-10月，月生產量猛增為一千萬枚。佩帶毛澤東像章已成為文革開始以來的「時尚」，甚至有的電影院檢票進場時，還得查看是否佩帶毛像章。

其實，導致毛澤東像章流行的契機是「大串聯」。大串聯的全國性人流互動，尤其當紅衛兵在文革的「策源地」受到領袖接見後返回原地，更是帶着一種膜拜的心情，仿效北京的做法。據9月26日上海團市委召開的「大學團委書記座談會」記錄：復旦大學介紹，紅衛兵從北京串聯回來後，在「全校搞了三千多塊毛主席語錄，從宿舍到食堂氣氛大變化，校廣播台每天宣傳六次毛主席語錄，每次十分鐘，每天早晨每個班級集體朗誦半小時語錄」；華東師大介紹，「學生會前讀語錄」，紅衛兵大隊部正籌備「我見到毛主席」徵文和「我見到了毛主席詩歌朗誦會」<sup>④</sup>。如果說這是構創着一種氛圍，在這種氛圍下人人佩帶毛澤東像章蔚然成風。那麼，大串聯使紅衛兵們每到一地，都有獲得一枚甚至數枚毛澤東像章(或紀念章)的機會，只是供應單位必須在學生證(或紅衛兵證、串聯證)上加蓋「像章已購」的圖印<sup>⑤</sup>。與此同時，上海也向外地來滬串聯的紅衛兵供應毛澤東像章<sup>⑥</sup>，加上來滬串聯的紅衛兵不斷把外地品種的毛澤東像章帶進來，便直接促成了毛澤東像章的收藏和交換。

應該承認，大多數人參與毛澤東像章交換的目的是為了收藏，這是因為毛澤東像章確實具有收藏的品質。從材質看：有金屬類(如鋁、銅、合金等)和非金屬類(如塑料、陶瓷、有機玻璃、大理石等)；從工藝看：有機製和手工等；從類別看：有對章、套章、系列章等；從圖形看：先多以圓形的毛澤東正面或側面的頭像為主，後出現方形、矩形、心形、旗形、船形、書形、火炬形、燈籠形、五角星形等不同的式樣，且鑄刻着「紅旗」、「松柏」、「紅太陽」、「向日葵」等圖案和「忠」、「東方紅」、「為人民服務」、「大海航行靠舵手」、「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等標語<sup>⑦</sup>。還有的像章或者為了某次事件，如「安亭事件」、「一月革命」<sup>⑧</sup>；某次會議，如「九大」而製作。或者背後鐫有「中國上海」、「7341部隊」、「中央文革聯合接待室」等顯示地位的字樣。有的則屬於紀念章系列，如韶山、井岡山、遵義等主題為「革命聖地」的徽章(這套主題為「革命聖地」的紀念章系列，雖在當地發售，卻由上海生產。因品質精良，很受歡迎)，均吸引着人們去追逐、去尋覓、去投放財力和精力。

在此，可以認為毛澤東像章的流行，是在一個非常時期裏產生的新的收藏門類。從一定的意義上理解，也可認為是從一個非常時期裏孕育出的社會時尚和審美情趣。尤其是在「古玩」、「集郵」等均遭遇「革命」的情形下，以「熱愛」和「崇敬」的名義收藏毛澤東像章，實際上是人們審美趣味的轉移。同時，還應進一步看到：對於毛澤東像章的收藏和審美，一旦被社會認同和確證後，並非所有參與其中的人，都會持續地把熱情和注意力凝聚在它的政治內容方面，即總有一部分人會更加關注毛澤東像章的種類、圖案、造型和品相，以滿足收藏和審美的需要，這種欣賞和把玩的態度，實際上是疏遠着、消散着毛澤東像章所蘊含着的政治意味——而這恰恰屬於正常的社會選擇和心態(非常中的正常)。

## 二

人們相互之間交換毛澤東像章是很自然發生的，因為沒有交換就不可能擴大收藏，豐富審美。但這種交換走出了熟人的圈子，走向了社會公共場所——

對於毛澤東像章的收藏和審美，並非所有參與其中的人，都會持續地把熱情和注意力凝聚在它的政治內容方面，即總有一部分人會更加關注毛澤東像章的種類、圖案、造型和品相，以滿足收藏和審美的需要，這種欣賞和把玩的態度，實際上是疏遠着、消散着毛澤東像章所蘊含着的政治意味——而這恰恰屬於正常的社會選擇和心態。

多集中在車站、碼頭、廣場及交通通達之處——形成了匿名者之間的集體交換行為，其發生的機緣和動因，其交換的原則和動機，就不是一般「收藏和審美」的理由可以解釋了。1967年1月，上海的工人造反隊和紅衛兵曾自發地拉起零星的隊伍，對正處於發育狀態的交換場所進行了衝擊，但「由於缺乏領導，問題沒解決」<sup>⑨</sup>。2月12日，《解放日報》加短評「這裏又是一場階級鬥爭」發表了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革命造反隊的來信，來信不僅指出：當前市區十多處像章交換場所，「從早到晚聚集大批人群」，「像北站天目路至河南路一段，南京路江西路至河南路一段等都已嚴重影響了交通」；且這種不問對象是誰，懷着各種不同動機的交換「既不是建築在相互之間革命友誼的基礎上，更不是出於熱愛偉大領袖的共同願望」，因此在政治上「是極不嚴肅和極不負責的」；更指出：這種交換場所已經由自由交換發展為買賣或變相買賣，所以「日益暴露了它是一個典型的打着紅旗反紅旗的場所，日益暴露了這裏有着一場尖銳複雜的階級鬥爭」。這一系列的指認是一個明確的社會信號，雖然它以造反組織的名義出現，卻是首次在大報上披露；雖然它以群眾來信的形式出現，卻是在事實層面揭示了毛澤東像章交換中的牟利傾向，在政治層面標示了毛澤東像章交換背後的「嚴重鬥爭」。

然而，這樣的威迫並沒有起到作用，交換毛澤東像章的人群繼續在市區數十個場所聚集着，活動着（為防止衝擊，不少交換者將像章別在袖章上、毛巾上，甚至別在衣套的內襯裏。一遇情況，便可捲進口袋，扣上鈕扣，裝作路人）。於是，工總司等十八個造反組織發出〈緊急通告〉，上海市公安局革命造反委員會（公革會）發出〈取締通令〉。2月23日下午，紅三司、紅上司等紅衛兵在公革會的配合下，聯合對毛澤東像章交換場所進行了衝擊。當時，紅衛兵和公革會的宣傳車開到現場，立即張貼〈緊急通告〉和〈取締通令〉，「開展了強大的政治攻勢」。因事先有衝擊者裝扮成交換者遊走在交換場所，盯住了幾個主要人物，衝擊一開始，這些人便被扭住。「公安部門揪出了一些混在其中進行違法亂紀的人。這些人有的在交換場所用紀念章調換其他物品；有的把尚未製成的紀念章毛坯大批帶出來交換」<sup>⑩</sup>。其實，這次現場衝擊行動是經過嚴密策劃的，因為從組織機構看，市公安局、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造反組織已會同工總司、教革會、新革會、紅三司等組成了「取締紀念章交換場所聯合工作組」（至3月份，有七個區也建立了「取締紀念章交換場所聯合工作小組」）<sup>⑪</sup>。從準備工作看，市公革會、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造反組織已查獲了一些「盜竊、詐騙、投機倒把份子」，例如在閘北區有一人用錢或紀念章購買、換取空白介紹信，套購了大量紀念章在交換場所倒賣；還有人用請客吃飯、給零錢的辦法，唆使青少年三天內在交換場所賣出二千多枚毛澤東像章；還有七個青少年身帶凶器，翻牆越入工廠偷竊紀念章，被捉拿時當場追回一千四百多枚等<sup>⑫</sup>。從宣傳上看，第二天《解放日報》、《文匯報》「本報訊」的文字，完全是一模一樣的統發稿，並故意張冠李戴地指責，這「完全是舊市委的大陰謀」。只是《文匯報》加了「本報評論員」文章〈黑市場不衝不垮〉；《解放日報》加了「編者按」，引用了毛主席語錄「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

在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上海十多處已成規模的毛澤東像章交換場所的背後，確實存在着為利益所驅動的經濟活動，而且這種經濟活動有的甚至踏進了「違法」的行列。再據市公安局、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革命委員會的〈工作總結報

1967年2月，《解放日報》發表了造反隊的來信：當前市區十多處像章交換場所，「從早到晚聚集大批人群」，這種不問對象是誰，懷着各種不同動機的交換在政治上「是極不嚴肅和極不負責的」；這種交換場所「日益暴露了這裏有着一場尖銳複雜的階級鬥爭」。這封信揭示了毛澤東像章交換中的牟利傾向，在政治層面則指出毛澤東像章交換背後的「嚴重鬥爭」。

在上海十多處已成規模的毛澤東像章交換場所的背後，確實存在着為利益所驅動的經濟活動。1966年12月起，就有某人先後替十九個單位加工鋁皮六百三十公斤，紀念章十三萬隻，通過抽頭的辦法牟利六百餘元；1967年1月，長寧拉手廠出現一個集團，在武夷路開設「地下工場」，「油漆車間」等分別設在成員家中，大量加工各類紀念章（現場查獲一萬三千多枚）。這正是上海文革處於稱為「經濟主義風潮」和「一月革命」的時期。

告〉記錄：1966年12月起，就有某人先後替十九個單位加工鋁皮六百三十公斤，紀念章十三萬隻，通過抽頭的辦法牟利六百餘元；1967年1月，長寧拉手廠出現一個集團，在武夷路開設「地下工場」，「油漆車間」等分別設在成員家中，大量加工各類紀念章（現場查獲一萬三千多枚）<sup>③</sup>。殊不知，這正是上海文革處於稱為「經濟主義風潮」和「一月革命」的時期。一方面造反派呼風喚雨，吶喊天下，標樹革命的權威；另一方面造反派橫衝直撞，搶班奪權，造成動蕩的時局。實際上，恰恰就是在這段無政府的亂局中，在這段各種政治勢力衝撞的縫隙中，存在於毛澤東像章交換背後的「利益空間」徹底地顯露了，並迅速地被一批機敏者和投機者無阻攔地進入、佔領。待到1967年2月，上海的造反派通過「一月革命」的奪權左右政局以後，再來關注、收拾毛澤東像章交換場所出現的混亂局面，這個局面已很難收拾了。

### 三

在2月24日《文匯報》、《解放日報》「取締紀念章交換場所」的報導和評論中，曾提到上海的「這股歪風愈刮愈大，並且影響到全國各地」。外地紅衛兵也反映這「對外地都有很大的影響」<sup>④</sup>。這說明外地的一些城市也漸漸出現了類似的交換場所，只是行進在其中的風愈刮愈「歪」，上海作為「風源之地」是脫不了關係的。1967年3月1日，國務院商業部、物資部、第二輕工業部發出聯合通知，指明上海文化用品採購供應站為上海地區毛澤東像章業務經營單位，並分配製作像章的鋁材六十噸<sup>⑤</sup>。這實際上是國務院有關職能部門對上海毛澤東像章的生產和經營，也包括對已出現的毛澤東像章交換場所提出了整頓和管理的要求。

3月11日，市革委會「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市公安局、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聯合發布了〈關於取締交換紀念章場所，嚴格管理紀念章生產的通告〉。〈通告〉共列五條，除了繼續強調：堅決取締紀念章交換場所；不聽勸告者的紀念章一律收繳等，更指出：現在許多工廠擅自設計、開模，有的圖形不標準；有的有嚴重政治問題；有的挪用生產原料；有的以協作為名進行私分。「五類份子和投機倒把、流氓盜竊份子從中興風作浪，破壞文化大革命」。為此規定：凡非法生產、套購、轉手倒賣及盜竊者將分別由工商和公安部門處理；紀念章生產統一歸市輕工業局、市手工業局負責，其他單位不得開模生產，已生產的應由本單位的革命組織追查，並上交主管部門。

3月20日，市公安局、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又向市革委會提交了〈關於取締交換紀念章場所，嚴格管理紀念章生產的請示報告〉。〈報告〉稱：2月下旬，工總司、紅三司、紅上司等群眾組織曾集中上千人的兵力反覆衝擊紀念章交換場所，有的已達七至八次。一些交換場所範圍縮小，個別場所消失。今後打算加強現場的廣播和大幅標語的宣傳，以固守陣地為主，衝擊為副，或者佔領與衝擊交叉進行。目前，市輕工業局、市手工業局所屬六十多家工廠負責生產毛主席像章，統一分配供應（數量已達三億枚以上）。但現在一般工廠企業、事業單位、部隊機關，大到造船廠，小至生產組，不經審查，擅自生產，挪用、套購原料（有的拆掉機器上的鋁製防護罩），提成、私分的面很廣，協作、採購也要

以送紀念章為條件。紀念章亂翻花樣，向裝飾品和「集郵」的方向發展。一大批紀念章的圖形不符標準，甚至出現嚴重的「政治問題」（毛主席頭像被歪曲，「有的把圖形搞成很像劉少奇」）。為此建議本市設立專門的審查機構。同時，因全國解放軍很多兵種來滬採購、開模和加工紀念章，也需要有統一的部門掌握。

3月21日，市革委會「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發出〈關於嚴格管理紀念章生產的通知〉，嚴肅地指出：凡非專業生產紀念章的單位一律停止開模和生產，並清理（因有出租和外借）、上繳所有模具、成品；原料、電鍍等單位一律不得向非專業生產部門提供原料或加工；各專業生產廠按主管局的任務進行生產，不得擅自接受外單位的協作加工。最後強調：「要提高警惕，檢舉揭發五類份子和投機倒把份子的活動。」

從3月11日到21日，短短十天內就有三份關於毛澤東像章的文件上傳下達，其態勢可謂嚴重而緊急。確實，這變化了的「嚴重而緊急」的態勢已不單顯示出毛澤東像章交換場所繼續存在等問題（儘管造反派屢屢衝擊，並創造了「固守陣地為主，衝擊為副」、「佔領與衝擊交叉進行」等經驗，也取得部分成效，即南京路黃陂路口、北站、曹家渡、提籃橋等原十二處交換場所的「規模縮小了，個別場所甚至消失了」。但事實上，那些交換場所並沒有真正消停，而是分散化、游動化、小型化了。因為在這段時期裏，全市範圍內的毛澤東像章交換場所已增加至三十五個）<sup>⑥</sup>，並突出表現為許許多多、大大小小的單位及群眾組織正在泛濫性地生產各類毛澤東像章，且誰家都有漂亮而充足的理由，誰家都有聰明而通暢的辦法。尤其當這些單位、群眾組織之間相互攀比，形成了集體認同、集體追逐的社會心態，單位和群眾組織的種種資源、渠道和便利，便會被充分地調動和使用。

5月7日，市革委會批轉了市革委會經濟計劃組、市公安局、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關於毛主席像章和紀念章的生產、分配和管理問題的報告〉。〈報告〉指示各專業局指定專職幹部對所屬單位的「紀念章生產」問題實施監督、檢查，並責成各專業局負責將收繳的紀念章模具、紀念章半成品上交市革委會。為此，各專業局十分重視，紛紛召開會議研究「制止非法生產」，並制定措施予以落實。

應該承認這次整肅活動是抓住了要害的，因為有關部門在從根本上制止泛濫性生產。相比而言，泛濫性生產是源頭，轉手、倒賣、套購、盜竊等行為是這種源頭的惡性伸展，交換場所僅僅是連接這種源頭的外部空間（其內部的交易駭人聽聞）。現在堵住了源頭，一系列「非法行為」和交換場所自然也就萎縮了。同時應該承認這次整肅活動是動用了權威的，因為從1月份紅衛兵零星隊伍對交換場所的衝擊；到2月份報刊上發表群眾組織的來信，工總司等發布有關〈緊急通告〉及紅衛兵有組織地對交換場所的衝擊；再到3月份市有關管理部門接連下達各項指令和措施；直至5月份市革委會出面批轉了有關〈報告〉，市革委會作為「一月革命」後的權力機構才正式對「毛澤東像章問題」作出表態。其實市革委會是一直躲在背後掌控的，只是它希望通過造反組織和職能部門來解決此類問題，但事實迫使它最終不得不走向了前台。這次整肅活動因指令強力，措施周密，客觀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至6月，各專業局通過清查，共上交紀念章模具416副，紀念章成品、半成品466,000多枚，原材料300多公斤；社會上共處理紀

從3月11日到21日，短短十天內就有三份關於毛澤東像章的文件上傳下達，其態勢可謂嚴重而緊急。但事實上，那些交換場所並沒有真正消停，而是分散化、游動化、小型化了。許多大小單位及群眾組織正在泛濫性地生產各類毛澤東像章。尤其當形成了集體認同、集體追逐的社會心態，單位和群眾組織的種種資源、渠道和便利，便會被充分地調動和使用。

念章交換者14,769人次，收繳紀念章91,301枚，紀念章模具63副。處理人員中被公安部門追查的「違法」份子共28人（其中職工13人、青少年12人、小業主1人、四類份子2人），後審查拘留22人、警告2人、教育釋放4人<sup>⑦</sup>。

## 四

現在看一些「審查拘留者」的材料<sup>⑧</sup>：

長寧拉手廠一集團從廠裏盜竊電化設備和物資，開設「地下工廠」。其中朱某一人組織生產紀念章四十三萬隻，得利五萬隻左右。

楊浦公安局交通隊民警衛某（稱其「解放前曾二次參加反動組織」）利用公安人員的身份套購鋁片1,231公斤、鋁錠206公斤，加工成像章47,000多枚，從中獲利。家中草房翻造成二層樓房，用像章拉關係，在長陽木行、平涼木料商店購得只供應房修站的磚、瓦和木材。

上海安裝公司施工科安全員周某（稱其「1957年、1961年兩次貪污受處分」）騙得三張介紹信，以東海艦隊某部的名義加工像章137,650隻，賣出49,504隻，得利3,473.64元。周的手法是「虛報成本，騙扣原料，抬高價格」，例如一公斤鋁板可作「為人民服務」橫條550枚，周說只能做320枚；頭像加工費兩分半一枚，周收五分一枚；圓頭像成本五分一枚，周以一角至兩角出售。有五個紅衛兵參與周的活動。

上鋼五廠供應科陸某通過中間關係以一台六十噸沖牀，與浙江平湖城關白鐵社調換九萬隻像章，以支付運輸費為由，每隻加價一分獲利900元。機動車間原工會負責人陳某與盧灣區稅務局張某、王某等，動用生產鋁片在車間沖製各種像章八萬多隻，部分分發給工人外，大部分私分。

江浦五金廠會計羅某通過手工業局石某調撥鋁錠659公斤，加工成鋁片倒賣426公斤，獲利249.60元。同時，羅以220公斤鋁片自製像章五萬多隻，除被塗黃、油漆過程中提成外，得像章三萬隻，售出18,000隻，獲利500多元。

市手工業局工具設備公司所屬寶華冶煉廠革委會成員夏某盜竊紅旗徽章廠送來回爐的不合格像章一萬多枚，委託外單位電化、點漆後出售，從中漁利。

工總司醫工指揮部從寧波搞來48,000隻像章加價出賣，獲利400餘元。後又挪用生產原料加工成兩萬隻像章，獲利600多元。這些像章從保管到定價都由醫工指揮部的第一把手賀某經手。

其他還有無業者祝某（稱其「1961年就販賣黃金、手錶、自行車、票證等」）從事上海與廣州、武漢及東北各地區的像章倒賣，有時還坐飛機，生活非常闊綽。

考查上述事實，可見隱藏在毛澤東像章交換背後攪擾局面的這些人，多是在單位裏施工科、供應科、會計科等擔任着一份對外聯絡的工作，見識廣、信

考查「審查拘留者」的材料，可見隱藏在毛澤東像章交換背後攪擾局面的這些人，多是在單位裏施工科、供應科、會計科等擔任着一份對外聯絡的工作，見識廣、信息靈、關係熟，手頭不僅有些資源，還有些運作的機會和權利；多有些「貪污」、「販賣」的經歷，膽子大、門路熟；多是通過挪用、調換、套購等手段，直接進入原材料和生產的過程中，大批量的掌握着紀念章的進進出出。

息靈、關係熟，手頭不僅有些資源，還有些運作的機會和權利（有些革委會、造反組織的頭頭也有這份便利）；多有些「貪污」、「販賣」的經歷，膽子大、門路熟；多是通過挪用、調換、套購等手段，直接進入原材料和生產的過程中，大批量的掌握着紀念章的進進出出；多是將手臂伸向外地的企業，通過與外地企業的種種交易，最大程度地獲得利益。

再從事實出發作進一步的推究，可見這批人在參與交換毛澤東像章的人群中，甚至在因交換毛澤東像章而受處理的人群中，都只是一個極小數。那麼，這「極小數」的人怎麼會翻捲起如此大的動靜呢？毛澤東像章成為社會的緊缺商品，以致顯露出巨大的「利益空間」；這「極小數」的人能量大，掌控着從製作到銷售的各個環節，客觀上引導了市場和交換場所的走向。如果說這些因素屬於內在的趨動，成千上萬的群眾或出於熱愛，或出於喜歡；或為了收藏，或為了消遣；抑或為了通過投機性地調來換去、買進賣出獲取一些實惠，賺取一些差價，而參與到、投入到毛澤東像章的交換和交易中來，實際上是起到了支撐着、托舉着市場和交換場所的作用的。在此，這「極小數」人的作用與絕大多數人的作用互動共存，前者帶動着後者，後者呼應着前者；前者誘惑着後者，後者成全着前者，這種融混一體的關係確實是很難剝離的。

與此同時，輿論認為毛澤東像章交換的背後存在着「嚴重的階級鬥爭」，不管是主導思想的判斷，還是追求宣傳的效果，事實上的「階級敵人」子虛烏有——就連被公安機關追查的二十八人中，列為「四類份子」的只有二人。再如前述上海安裝公司施工科安全員周某被虹口公安局拘留，後經公檢法軍管組批示也只是「交群眾批鬥，給行政處分」。結果反倒是「上海安裝公司的革命群眾意見很大，要求（給周）戴上帽子，實行管制」<sup>⑩</sup>。看來在強調「階級鬥爭」的年代裏，「階級鬥爭」的觀念已存在於群眾的意識中，群眾的激動和憤懣，有時是會超越政策界限的。

在被公安機關追查的二十八人中，列為「四類份子」的只有二人。上海安裝公司施工科安全員周某被虹口公安局拘留，後經公檢法軍管組批示也只是「交群眾批鬥，給行政處分」。結果反倒是「上海安裝公司的革命群眾意見很大，要求（給周）戴上帽子，實行管制」。看來「階級鬥爭」的觀念已存在於群眾的意識中，群眾的激動和憤懣，有時是會超越政策界限的。

## 五

市革委會對交換毛澤東像章的整肅行動，尤其從源頭上制止各單位的泛濫性生產，確實收到了一定成效。但在整個毛澤東像章的交換和交易中，由部隊製作而投入的品種，不僅質量上佳，而且數量巨大。市革委會及所屬部門不能指揮部隊，自然也就不能制止部隊系統毛澤東像章的生產和流通。

1967年5月5日，為了統籌性地解決問題，市革委會邀請駐滬三軍及輕工業、手工業、各區縣工業局共同研究部隊生產毛澤東像章的問題。會議建議駐滬部隊的自行生產由東海艦隊、上海警備區、7341部隊政治部管理。外地部隊委託上海加工，均憑三軍政治部的證明，由本市輕工業、手工業局安排。顯然，市革委會的「建議」和「安排」是比較圓通的，但因並不具有實質性的約束力，也就只能起着提醒、督促和規範的作用。所以，當時仍有許多部隊因相信上海的技術，直接在上海委託企業製作毛澤東像章，有的甚至與聯繫人之間產生了私下裏的交易。在上海的整肅行動中，就曾查處過這樣的事例。如市手工業局工具設備公司所屬寶華冶煉廠革委會成員夏某，以支援部隊為名，調用大量鋁

錠，先後為十多個部隊加工毛澤東像章（這些部隊的介紹函件均不完備），其中有六七個部隊的人與夏某發生像章交換生鐵、沖牀、馬達等秘密的物資交易，部隊的人還將桂圓肉等土特產送至夏家。夏的兒子拿着一大包為部隊製作的像章在交換場所出賣而被拘留。江浦五金廠會計羅某通過東海艦隊的關係，向鋁材二廠套購鋁錠480公斤製作像章，從中剋扣邊角料另行生產獲取利潤<sup>②</sup>。

或許因為在文革時期部隊佔據特殊的地位，或許在人民群眾的心目中，部隊享有崇高的權威，總之，部隊在製作毛澤東像章以表示對領袖的愛戴和效忠方面，其規模、手段，不僅是地方不能企及的，甚至是不敢想像的（自然也是少有管束的）。據市革委會政宣組1967年12月引用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營業部的報告：9月，某部隊與上海金屬工藝一廠用紫銅訂製毛澤東像章1,557隻，其中鍍金860隻，用去黃金8克；鍍銀670隻，已全部加工完成。後部隊又自備紫銅78.3公斤，黃金57.4克再訂製8,600隻，結果鍍金完成2,760隻後被有關部門發現並勸止。11月，某空軍部隊自行加工鍍金毛澤東像章276隻，用去黃金14克。因製作效果不理想，就向上海分行提出申請：「因航空零件鍍金，需用黃金4克。」上海分行撥出黃金並交上海金屬工藝一廠，後發現是用於鍍金加工毛澤東像章，便及時截止。兩部隊分別用去黃金57.4克和14克，均是「從墳墓裏挖出來的」。可見，部隊的這些做法已嚴重違背了中央的有關規定，但是，誰能管得了呢？直至中共「九大」前後，交換場所中出現了許多大號、特大號的毛澤東像章，也多是由部隊出品的。

部隊在製作毛澤東像章方面，其規模、手段，不僅是地方不能企及的，甚至是不敢想像的（自然也是少有管束的）。據市革委會政宣組1967年12月引用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營業部的報告：11月，某空軍部隊自行加工鍍金毛澤東像章276隻，用去黃金14克。因製作效果不理想，就向上海分行提出申請：「因航空零件鍍金，需用黃金4克。」

## 六

考查上海1967年下半年及以後幾年毛澤東像章生產和流通的情況，據1967年6月23日市革委會經濟計劃組向市革委會提交的〈關於毛主席像章和紀念章生產管理工作中幾個問題的報告〉稱：「5月7日報告後，自發生產已停止，非法交換已減少。」其實，這種「停止」和「減少」只是外力壓迫的結果，不是內在要素的解散；只是一時的效應，不是長久的治理，所以只是抑制，不是制止。隱匿性的「地下生產」和游動性的交換、交易繼續存在。同時，「仍有不少單位和群眾組織認為有特殊需要，要求自行設計和加工。如上海合唱團演出交響樂《沙家浜》；上海鐵路系統準備搞『一月革命』紀念章等」。為此，市革委會經濟計劃組重申：「確有全國、全市紀念意義的報市革委會批准，由市手工業局負責生產。外地來滬加工的一律憑省市介紹信，由二輕局負責生產」等。緊接着，7月10日，市革委會工交組又發出了〈關於進一步加強像章生產管理的通知〉，再次強調：未經市革委會批准，任何單位一律不准委託本市和外地工廠加工像章；已生產的原材料、半成品一律上繳；特殊需要報市革委會同意。由此可見，整肅了的局面還是相當敏感和脆弱的，它甚至需要市革委會每月都發出一個「須報市革委會批准」的指令，來加以管制和維護。究其緣由，生產和交換的活動仍在此起彼伏地進行，隨着形勢的發展又變通着出現了造反組織紛紛生產「隊徽」、「隊章」的情況，更何況群眾對毛澤東像章及有關紀念章的需求，繼續保持着不減的熱情，



這確實不是一紙文件就能解決的問題。當時，許多逍遙着的學生、工人甚至把像章當作「賭資」，通過打牌、下棋等手段來贏取。還有些流氓習氣的青少年發明並練就了一套快速而隱蔽地摘取他人胸前像章的手法（靠近他人後，迅速地捏住像章別針的尾部，順勢往上一彈、一抽），以至流行開來。一些來不及製作像章的單位也不甘心，例如12月2日，同濟大學東方紅兵團就直接向市革委會寫報告，聲稱：市革委會通知下達後，我校紀念章生產正進行一半，這樣，有的人發到，有的人沒有發到，意見很大。希望市革委會批准繼續做下去。同日。市革委會回覆（同濟大學東方紅兵團為市革委會強力扶持的紅衛兵組織）：既成事實的問題，可以考慮解決。但此事傳開有影響，如果各校找紅代會如何回答。建議你們研究，寫情況報告中要表明數量概念和引以教訓的態度。三天後，市革委會又發布了〈關於製作和發行毛主席像章的幾點補充規定〉，以權威的口吻再三強調：「未經市革會政宣組批准，任何單位一律不准製作、發行像章」，但這種權威到底又能產生多大的威勢和成效呢？

「九大」召開前後，上海和全國一樣出現了新一輪製作毛澤東像章的高潮，且這一輪的製作多為歡呼「大好形勢」，有着明確的政治指向，所以，在像章的規格和圖案上翻出了許多新的花樣，如「大海航行靠舵手」、「九朵葵花向太陽」等，有的直接就將毛澤東在「九大」作報告的形象鑄刻成了畫面。上海碳素廠的工人甚至動用黃銅，翻鑄了直徑為一百毫米的毛澤東像章<sup>②</sup>。面對如此狀況，市革委會仍然試圖「統一管理」，比如1968年6月，市革委會批准了手工業局、輕工業局所屬專業定點廠，「擬大量生產」迎接「九大」紀念章的申請報告<sup>③</sup>。1969年4月12日「九大」召開之際，市革委會發布了〈關於定點敬製毛主席像章的通知〉（與兩年前強調的內容如出一轍），規定：上海紅旗徽章廠、上海金屬工藝二廠、三廠、上海日化製罐廠、創新工藝品一廠、上游塑料廠、工農髮夾廠和精藝模具廠可以敬製毛主席像章。其他任何單位一律不得自行敬製，一律不得接受任何地區、單位敬製像章的任務<sup>④</sup>。在此，連續兩個「一律不得」，不是反證了許多單位正在「自行敬製」、正在「接受敬製」嗎？事實也確實如此，據《支部生活》報導：1969年1月起，上海碳素廠革委會、工人造反隊就開始「搞像章」，先後「經手的有四萬多枚」，3月還為像章發生了打架事件。儘管局革委會多次批評，4月8日，上海碳素廠仍動用生產車輛去浙江湖州搞像章，結果途中發生嚴重車禍。5月18日，上海鐘廠革委會生產組和沖壓車間造反隊頭頭擅自接受了浙江金華製作六萬枚像章的任務，便利用廠休日叫幾個老師傅和女藝徒通宵加班，結果加工了一萬多枚時出了工傷事故，只得將原材料和模子轉移。同時，南京西路人民公園門口、黃河路等處又滋生出了毛澤東像章交換場所<sup>⑤</sup>。與兩年前的情況比較，圍繞着「九大」出現的毛澤東像章製作熱潮，除了像章形式的變化外，那這次是基層革委會、造反隊出面的多，公開動用生產資料和生產工具的多，而市革委會及所屬部門的種種通告，則顯得是老調重彈，形同虛設了。

然而，高潮的到達，也就意味着滑墜的開始。從1966年下半年隨文革而興起的毛澤東像章熱，到1967年上半年因發生種種變異而複雜、而迷離、而受到衝擊和整肅，期間，儘管也收到階段性的成效，但其源流未曾斷過，直到1969年「九大」前後，毛澤東像章熱終於在萬眾的歡呼中走向了高潮。1970年以後，隨

「九大」召開前後，上海和全國一樣出現了新一輪製作毛澤東像章的高潮，且這一輪的製作多為歡呼「大好形勢」，有着明確的政治指向。與兩年前的情況比較，這次是基層革委會、造反隊出面的多，公開動用生產資料和生產工具的多。1970年以後，隨着政治形勢變化，千千萬萬青少年因上山下鄉離開了城市，以及社會心理認知的集體性轉移，毛像章的生產和交換，也就漸漸地消歇了。

着政治形勢變化，隨着千千萬萬青少年因上山下鄉離開了城市，隨着社會心理認知的集體性轉移，毛澤東像章的生產和交換，也就漸漸地消歇了。同年，上海所有的專業定點廠從此停止了毛澤東像章的生產<sup>⑤</sup>。

### 註釋

- ① 《上海二輕工業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二輕工業志》（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7），頁119。另據《上海日用工業品商業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日用工業品商業志》（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記載：上海1966年第四季度供應毛澤東像章3,924萬枚。1967年供應達1.3億枚。至1969年，按市革委會〈定點精製毛主席像章〉的通知，商業部門退出經營，由市手工業局工藝美術服務部負責經銷。此時，積壓在倉庫中的種類像章有634萬枚，價值十餘萬元（頁104）。
- ② 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關於取締交換紀念章場所，嚴格管理紀念章生產的請示報告〉（1967年3月）。
- ③ 夏冬元主編：《二十世紀上海大博覽》（上海：文匯出版社，2001），頁858。
- ④ 1966年9月26日共青團上海市委員會「大學團委書記座談會」記錄。
- ⑤ 1966年10月，筆者曾在重慶排隊一小時求購一枚毛澤東像章。同時見有機靈者，一人持三份證件，通過同行者的間隔插隊，得三枚毛澤東像章。
- ⑥ 據上海工總司〈打倒黑黨委〉材料和《上海青年誌》記錄：至12月，因原材料短缺，上海毛主席像章的月生產量減產四百萬枚。為了促成外地學生早日離滬，市接待辦公室決定向已辦妥手續的外地學生贈送別於胸前的有機玻璃語錄牌（已不是金屬像章）。11月27日，各基層接待站共領去語錄牌二十四萬枚。
- ⑦ 王懿麟：《文物知識與鑑賞》（香港：中華國際出版社，2002），頁317。
- ⑧ 當時，「一月革命勝利萬歲」的紀念章在上海是十分流行的。據《支部生活》（1967年第17期）王秀珍文章〈永遠緊跟毛主席〉記載：1967年5月1日晚，毛澤東、林彪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了北京市革委會全體成員和上海市（一行八人）、山西省革委會代表團，並合影留念。楊成武把我帶到毛主席身邊，對毛主席說：「上海代表團的同志向您獻『一月革命勝利萬歲』的紀念章來啦！」我馬上從口袋裏拿出一把紀念章敬獻給毛主席，並激動地對毛主席說：「我代表上海一千萬人民和二百萬造反隊員向您老人家獻『一月革命勝利萬歲』紀念章。」毛主席接過紀念章，慈祥地笑着說：「給我這麼多啊。」我急着說：「不多呀，上海一千萬人民，一人一個的話，就拿不了啦！」毛主席又高興地笑起來，說：「謝謝，謝謝！」毛主席和我握了握手，我馬上說：「我們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毛主席繼續往前走，我和聶元梓同志挽着臂膀，緊緊跟着毛主席，一邊走，一邊喊：「我們緊跟毛主席！我們緊跟毛主席！」
- ⑨⑩⑪⑫⑬⑭ 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革命委員會：〈關於取締交換紀念章非法場所的工作總結報告〉（1967年8月）。
- ⑮⑯⑰ 《文匯報》、《解放日報》，1967年2月24日。
- ⑱ 《上海日用工業品商業志》，頁32。
- ⑲⑳ 1968年市革委會政宣組〈報告〉。
- ㉑ 《支部生活》，1969年第22期。
- ㉒ 1968年6月市革委會政宣組〈給市革委會的報告〉。
- ㉓ 《支部生活》，1969年第19期。
- ㉔ 《支部生活》，1969年第22、32、33期。
- ㉕ 《上海二輕工業志》，頁119。

**金大陸** 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從事知青史、上海文革社會生活史研究，《上海青年誌》主編，其他著述有《苦難與風流》、《世運與命運》等。